

清代东北移民与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孙守朋 李云峰

(大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清代东北地区大批量涌入移民,他们逐步同东北地区的各民族杂居生活,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互借鉴,在商业上进行互市贸易,在文化习俗方面逐渐融合。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东北地区形成了兼收并蓄、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又为东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群众凝聚力量。

关键词:清代东北移民;东北地区;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C952 **Doi:**10.19898/j.cnki.42-1704/C.2024121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24)12-0075-10

移民,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社会现象,其动因源自自然灾害、战争纷扰及国家政策变迁,此现象深刻塑造了社会结构与文明进程。东北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广袤未垦的土地,成为吸引移民迁居的重要场域。尽管清代移民政策时有松紧,对移民活动限制与鼓励交织,但东北移民的历史脚步始终未停止。这展现了东北移民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力,深刻反映了历史变迁中人口流动与社会重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目前,国内中华民族史学科领域的诸多学者已围绕清代东北移民的各类问题,从不同角度对清代各时期不同地区移民迁居东北的动因、移民来源、移民路线,以及移民对东北原有社会形态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同时,对于东北移民与当地民族融合的研究文章也逐步涌现。如,李宗双、范立君的《清末东北移民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文,主要

以清末为研究阶段,描述了东北移民与当地民族在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上的相互渗透^[1];王妍的《清代的东北移民与民族融合——以辽宁地区为例》一文,以辽宁地区为研究区域,以旗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其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民族融合^[2]。概括而言,学界多以清代部分时间段或局部地区的东北移民同当地各民族融合进行研究。就此,本文试图立足清代全时段、东北全区域多民族交融进行研究,以期更全面地反映东北移民与当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一、清代东北移民的历史进程

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本就地广人稀的东北变得更加“土旷人稀,生计凋敝”^[3]。清廷为充实根本,于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令》,清朝东北大规模移民政策就此确立。虽说后续由于清廷政

收稿日期:2023-03-06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辽宁地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L22AMZ002)。

作者简介:孙守朋,大连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民族史。李云峰,大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策调整,对移民有所限制,但就整体而言,仍有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境内。根据史实,清代东北移民可分为下述三个阶段。

1. 清初辽东招垦政策下的移民初潮。清廷入关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空虚的后方采取巩固措施。顺治元年(1644年)和八年(1651年),清廷曾发布两次谕令,鼓励汉人出关进入东北开垦荒地。随后,顺治十年(1653年)又正式向全国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其载:“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给月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4]除此之外,清廷还于康熙二年(1663年)、四年(1664年)、六年(1666年)连续三次颁布开垦令,并且对移入东北的汉人采取降低赋税的优待政策。在如此利好政策及优厚条件的吸引下,东北出现了汉人移民东北的初潮。

2. 清中期封禁政策下的移民涌动。康熙七年(1668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移民实边,辽沈地区已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清廷开始逐步对既有的移民政策进行调整。康熙帝宣布“辽东招民授官例,永著停止”^[5],后期又在东北修建了“柳条边”。康熙十九年(1680年),“柳条边”内开始划定旗界和民界,汉人须迁出旗界,禁止旗民混居^[6]。康熙时期对于东北的封禁并非十分严格,只是限制汉人出关,但至乾隆初期,迁居关外的人口数量已经相当庞大。乾隆五年(1740年)至七年(1742年),清廷陆续宣布对奉天地区、吉林地区及黑龙江地区的禁令,至此东北全部封禁,严禁关内汉人进入。虽然清廷已经对东北全面戒严,但仍未能阻挡住中原汉人向东北迁移的脚步。在此期间,大批量中原百姓不顾安危,纷纷涌向东北。东北移民不断的主要原因在于,清廷入关后中原地区的人口规模大幅上涨,导致生计

负担加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使得民不聊生,在当地难以生存下去,只能远走他乡寻找出路。东北封禁时期,当地的旗人也会冒着风险接应关内逃来的移民,其中缘由有二:一是清中期东北旗人占有大量土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耕种和开垦田地;二是东北地理位置偏远,生产资料与技术匮乏,亟需引入关内先进生产技术以提高粮食产量。故此,清廷虽有移民禁令,但出关入境东北的移民潮依旧涌动。

3. 清晚期弛禁政策下的移民高潮。嘉庆至道光年间,清廷对东北移民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既想维持封禁政策以保疆域稳定,又渴望通过开发促进资源利用与人口增长。自咸丰朝以降,清廷对东北封禁政策有所松动,由全面封禁官荒转变为仅封禁特定区域(如围场),再逐步变为积极倡导并鼓励移民迁入^[7]。

究其缘由,鸦片战争后的国际局势剧变成为移民政策调整的关键因素。西方列强的强势介入,深刻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地理格局。俄国利用中国东北相对荒凉、防御力量薄弱的劣势,对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广阔土地进行蚕食,使得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东北地区封禁的态度。同时,因长期抵御外部侵略的军备耗费,以及同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付的巨额赔款,使得清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国库空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通过引入移民开垦东北,收取赋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可以缓解危机。

东三省中黑龙江呼兰地区最先招民垦荒。咸丰七年(1857年),自呼兰城至蒙古尔山处,有“腴地百余万垧,并非采貂禁地,亦与夷船经由之路无涉,奏请弛禁开荒,所得钱粮以充俸饷”^[8]。随后,吉林和奉天地区于咸丰十年(1860年)、同治八年(1869年)陆续对局部空闲生荒地招民开垦。虽说此时移民规模仍旧有限,但东北人口已有大幅提升。根据赵

英兰所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数据统计:自咸丰十年(1860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年时间东北地区的人口已由369.6806万人上升至525.9482万人^[9]。增加的一百多万人口中移民应占大多数。

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清廷为拯救国家之危难,陆续发布一系列“新政”谕令,此即“清末新政”时期。在考察东三省概况后,徐世昌于《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中提出:若想振兴东北既需“充实内力”,亦需“抵制外力”^[10]。这其中所提及的“充实内力”,即“移民实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在继续丈荒的基础上,设立各类新式农业机构,鼓励关内移民垦荒实边。据不完全统计,至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整体人口达1996.4226万人^[9],可见东北移民猛增之势。清末新政时期的移民政策一片向好,使得各地移民迁居东北达到高潮。

二、清代东北移民与当地各民族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互借鉴

东北肥沃宜耕的土壤,湖沼遍布的水系,东湿西干的气候,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移民入境垦种。清代迁居东北的移民与当地各族人民,在农业生产技术上互鉴互利,在旱田耕种、水稻耕种以及畜牧养殖等方面实现了多元发展。

1. 东北移民与当地各民族在旱田耕种技术方面的相互借鉴。东北虽“地广人稀,但牛溲马勃,腐叶草根,遍地皆是,雍阏既深,遂化瘠土为沃壤”^{[11]697}。奈何人力不济,故而垦植粗放。清初,东北各民族耕种方式主要以“开荒轮耕法”为主,力求尽可能高效地发挥出土地的效力。方拱乾在《绝域纪略》一书中曾提及这一耕种方式,即“地贵开荒,一岁锄之,犹荒也,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12]。当土地荒芜数年后,地力逐步恢复,随之采取烧荒的方式烧光杂草和树木,如此反复。虽说通过此类举措,粮食产量相较

连年耕种有所提升,但抛荒过程却造成了生产的停滞。

随着中原汉人的移入,“换茬轮种法”被引入关外,替换了先前的“开荒轮耕法”。所谓“换茬”,又称“倒茬”,即在同一块田地上轮换种植不同种类的农作物。“今岁豆,明岁粟,三岁谷,周而复始,地乃不伤,故曰正权也;今岁粟,明岁豆,三岁复粟,此谓迎权;今岁粟,明岁又粟,此谓重权。二者既竭地力,故所获每不丰。”^[13]在此过程中,不同种类的作物既汲取了自身生长所需的养分,又在轮种中实现了其他微量元素的恢复。但东北土壤类别不同,若在所有土质下皆采取“换茬轮种法”,未必达到理想产量。

以满人为主体的当地民族和关内移民,深刻洞察不同土质下作物的生长态势,对传统耕种模式进行改良,最终探索出“休闲法”与“轮作法”并行的精耕细作模式。具体措施即在盐碱化较为严重的土地上,实施“休闲法”策略,遵循每年耕种与隔年休耕的循环规律,以此改善土壤结构,减少盐碱化对作物生长的不利影响。而对于肥沃的黑土地,则采用“轮作法”,科学规划高粱、谷子、黄豆等农作物的三年轮作周期,通过作物种类的有序更替,有效利用土壤养分,减少病虫害发生,维持土壤生态平衡。

这一共同探索出的旱田耕作技术优化路径,显著提升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农作物的产量。鉴于农作物产量实现了明显的增长,该技术在东北各民族间得到了广泛的采纳与效仿,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黑龙江志稿》中曾载:“近边诸旗,观汉人之务农,年年余盈,不胜企羨,近年来亦从事于耕植,凡设郡县之区,类皆农重于牧,操作亦仿汉人。”^{[11]697}

此外,在中原汉人迁居东北的进程中,东北的蒙古人不仅吸纳了中原的旱田农耕技术,还通过以牲畜交换汉人手中的铁犁、磨盘及锄头等农耕器械的方式,巧妙利用自身丰富的牲

畜资源,发展牛耕技术,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居住在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喇(今吉林市)的锡伯人在民族交往中逐步变更自己的经济生产方式,开始兼营畜牧、农业,同汉人移民在日常社交活动中逐步完善自身耕种技术。黑龙江流域的赫哲人,原本以渔猎为生,播种仅凭树叶转绿、草木萌生等直观感受到的自然现象进行,农业发展滞后。然而,通过与满人、汉人的交往,逐渐习得依据节气安排农时的科学方法,摒弃了原始的粗放耕作方式,转向了精细化的农耕模式。这一系列变迁不仅促使东北各民族在农作物产量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还丰富了农作物种类,逐步构建起完整且连贯的农业产业链^[14]。

2. 东北移民与当地各民族在水稻耕种技术方面的共同探索。清代东北移民潮中,随着朝鲜民众的迁入,朝式水田技术和优质朝鲜水稻品种也被引入东北。《凤城县志》载:“稻,俗名粳子,碾成米曰粳米……自高丽传水稻之种,始稍稍开池种植,谓水粳子,获利颇巨。”^[15]这段史料翔实地展现了朝鲜民众自古以来在水田耕作方面的卓越才能。清晚期,朝鲜移民最初在一些东北当地民众舍弃耕种的草甸地、芦苇塘以及涝洼地种植水稻,但初期产量并不理想。随着清廷出台对朝鲜移民的接纳政策,这些朝鲜移民开始向东北的“浑江流域”进行转移,并展开更为深入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清后期,朝鲜移民的迁移足迹又向桓仁和通化一带延展。光绪元年(1875年)在今辽宁省桓仁县下甸子地方试种水稻成功,光绪九年(1883年)于柳河三源浦地方大面积种植开来。

随着水稻种植的推广,中原汉人移民以及“南满”地区的满族人认识到种植水稻可获丰厚的利益,于是纷纷效仿朝鲜移民,采纳朝式水稻种植技术。然而,在种植过程中,朝鲜移民与东北当地民众逐渐意识到,从朝鲜引入的稻种在东北地区尤其是北部严寒区域御寒

能力较弱,达不到理想的预期产量。如何选育出适合东北气候的稻种,有待探索。

经过一系列地引进、育种尝试,他们发现引进的日本耐寒且早熟的稻种非常适应东北的生长环境,水稻产量较原来有所提升,但与日本相比,产量仍然稍逊一筹。朝鲜移民、中原汉人及“南满”地区的满人发现,尽管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等水稻种植区的沟渠修建和水田建造相对精细,但在播种时多采用较为粗放的撒播方式,导致很多稻种因昼夜温差大而未能发芽。若将稻种提前育芽,即可有效规避此类问题。东北移民和当地民众开始在夏至与芒种之间,先将稻籽浸于水中约一星期左右,使之生芽,再将稻田之水与水底之土搅拌混合,然后播种稻籽于田中。至立秋前后,穗出浆足,遂将田中之水泄出,过些日子即可收获。其中在立秋后进行放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时稻穗已经逐步地发育出来,田地中无需用水,否则因日后天气渐凉,会影响稻籽成熟。通过东北移民与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地探索水稻耕种技术,使得“提前浸泡育种法”和“秋后放水促籽成熟法”逐渐成为东北水稻种植技术特有的特征^[16]。

3. 东北移民与当地各民族在畜牧养殖技术方面的协同发展。东北移民群体在推进农耕技术的革新与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尽管他们掌握着相较当地更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与工具,却面临着大型牲畜资源匮乏的现实问题。所谓“凡耕者无不倚马、牛、驴、骡之力,即农产物之搬运亦无不以牲畜为役”^{[17]2802}。这一局限性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整个农耕体系的效能未能达到预期的优化状态。

然而,由于迁居东北的移民群体本不以畜牧养殖为生,所以导致其在畜牧业养殖技术方面的知识具有明显短板,饲养的牲畜屡遭疾病困扰。相比之下,东北当地民族对牲畜的养殖更加擅长,形成了一套因地制宜的畜牧养殖

体系。《梨树县志》载：“土人多养牝马、牛、羊，既可繁殖生财，又可以藉造肥料，一举两得，岂不甚善。至养豕之利，虽不及马牛羊，但以资本轻而生殖速，故家家皆养之。”^[18] 鉴于此，对于迁徙至此的移民而言，如何科学地开展牲畜养殖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首先，牲畜的饲草采集及存储，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要予以保障。在东北地区，牲畜的饲草主要以稗草和羊草两类为主。稗草“洼地甚宜，有水、旱之别。子可充食，茎可饲畜及苫盖用”^[19]⁵¹²。羊草“亦曰羊胡草。长尺许，茎末圆劲如松针，黝色油润。饲马肥泽，胜于粟、豆”^[19]⁵¹³。因这两类植物的强适应力和繁殖能力，所以被当地牧民作为惯用储备的牲畜口粮。东北相较于中原地区有更为漫长的冬季，因此，牲畜的饲草储备工作需提前进行，以确保冬季饲养需求得到满足。打制饲草的工作从中伏开始，一般整个过程会经历一至一个半月的时间。当地农户会趁饲草丰茂之际，收割可备冬春两季的存量，经晾晒处理后将其扎捆，存放于储草院内以应牲畜喂养之需。《黑龙江述略》中就曾对这一饲养方式作了详细记载：“江省牲畜，遍放于野，不以豆料麦屑饲之，至秋后畜于家厩，则喂以羊草。长尺许，色青而润，经冬不变，郊外随地皆有，四月即生，七八月将枯时，土人争住刈割，堆平屋顶上，约可供牲畜冬春之需。”^[20] 所以，以中原汉人为主体的移民群体，积极向本地牧民学习打制稗草与羊草等饲草以备冬季饲养的实践方法，成为饲养牲畜的首要保障。

其次，迁居东北的移民群体因为东北独特自然环境，仿照当地民族规划并搭建了包括马厩、牛圈、羊圈在内的一系列畜牧养殖设施。东北马厩的设计显著区别于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主要采用了季节性的布局策略。夏季马厩多设于院落东南角，减少午后强烈日光的直射；而冬季则调整至东北角，有效规避了凛冽

北风，尽可能地保证马匹所之处温度适宜。而牛圈的设立和马圈大同小异，只是牛圈上需搭建苫草棚遮，地上铺以稻草防寒。东北的羊圈很少设立在院内，多设在院落外，圈的外围墙用土坯垒成，或用柳条编织篱笆，或埋木桩子后用木条连成圈用以圈养牲畜。

除上述方面外，东北移民在牲畜的“去势”（即阉割）、疾病防控、品种选育等方面向当地民族诚心学习，皆促进了东北畜牧业的发展与成熟。奉天地区“腹地及东南部农民，以穉事为本务……举凡马牛骡驴羊猪鸡犬鹅鸭等类，有田宅之家，率皆畜之。或用其力，或用其肉，或资粪田，或利其产卵育子，要皆视为副业”^[17]²⁸¹²。上述《奉天通志》中所呈现的畜牧多元发展景象，充分显示清代东北畜牧业的发展是东北移民与当地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产物与显著成果。

三、清代东北移民与当地各民族在商业上进行互市贸易

在清代，随着移民定居东北，与当地民族群众在生产方面广泛交往交流，同时互市贸易也开展起来，主要进行经济作物、采捕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互市贸易。

1. 经济作物的互市贸易。清代东北各类土地的逐步开垦，除传统粮食作物产量日益提升外，经济作物种类亦趋于多元。诸多经济作物中，烟草以其独特的商品属性，成为了东北移民与当地民族之间互市贸易的重要媒介。

明末清初之际，烟草已传入东北，东北已有农户种植烟草。随着《辽东招民开垦令》的发布，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东北，东北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烟草种植业亦随之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东北原有烟草种植区域逐步扩大，种植技术亦有所精进。东北当地“人家隙地种烟草”^[21]，可作为一岁之生计。

随着烟草在东北大面积栽培与推广种植，当地居民逐渐认识到烟草在特定生产活动过程中，尤其是狩猎与采集过程中的独特作

用。在长白山区域,当地民众多投身于淘金、挖参及狩猎等各类深山劳作,而茂盛山林中蚊虫侵扰及毒蛇威胁,极大地增加了作业的风险与难度,烟草燃烧所产生的气味能够有效遏制蚊虫的聚集与叮咬,使毒蛇远离采捕劳作的人类。除此之外,东北地区由于冬季持续时间较长,烟草“可御寒,土人尤多食之”^[22]。与此同时,由于冬季农业生产活动被迫停止,当地人们便常常聚集在大车店、地仓子、花子房等地方来“猫冬”,以打发漫长冬日,缓解无聊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东北各民族人民便把抽烟作为一种“营生”,烟草由此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交媒介,打破了民族间的隔阂,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东北烟草的主要产地为吉林和黑龙江上游的部分区域。此外,包括黑龙江下游在内的赫哲人、鄂伦春人、费雅喀人、蒙古人等,均已传入了吸烟之习,甚至“达呼尔敬客以烟为贵,客或自吸烟,遽掣其筒,取己烟以敬,礼也”^[23]。然而,受地理环境制约,本地烟草产量极为有限,难以满足当地民众的广泛需求,故依赖他处输入成为常态。这一过程中,迁居东北开垦荒地种植烟草的中原移民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所种植的烟草成为与黑龙江下游本地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媒介。黑龙江各民族贸易往来的重要集散地“楚勒罕”,成为了经济互市的重要场域。

《黑龙江外记》载:“楚勒罕时,城西北穹庐遍野,男女杂遯,布特哈之所屯也。稍东为买卖街,列肆陈货,皆席棚。牛马市于日中,羊群散于原野。”^[24]²²⁴“楚勒罕”最初为贡貂收取缴纳场所,但因“布特哈向无商贩,其俸饱例于纳貂后支领,故楚勒罕时,城中集上无男女争买货物,为一岁之计”^[24]²²⁴。吉林及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烟草种植户,在完成对朝廷的年度贡烟义务后,便会携剩余烟草便汇聚于此换取生活资料。黑龙江下游的东北当地民族,多携带马匹、渔猎所得、手工织品及野兽皮毛等

换取自身所需的烟草。此外,迁居东北的中原移民也携带着茶叶、陶器、佩饰等,在“楚勒罕”市场上置换烟草。以“楚勒罕”为依托的物物交换的经济模式,不仅丰富了东北地区的物资种类,也促进了中原与边疆文化的深度交融,形成了多元共生的经济文化景观。

2. 采捕业产品的互市贸易。东北森林资源极为丰富,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处遍布各类原始森林。这些森林植被丰富,盛产人参、鹿茸、貂皮等名贵物产,就此催生出众多采参帮、捕貂帮等采捕群体。

人参以其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与貂皮和乌拉草被誉为“东北三宝”。但清廷对于东北人参的采挖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需造册发照,设官核验。同时,在“柳条边”沿线安设卡伦“以杜飞扬人参”^[25],对私采、私贩之人处以严酷的刑罚。然而,迁居东北的中原移民,为谋求温饱纷纷冒险潜入禁区偷创人参。“凡走山者,山东、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也。”^[26]

东北乌苏里地区遍布山岳河川、茫茫林海,地处寒带的最南端,又是亚洲季风的最北端,适于人参生长。乌苏里、绥芬、罗拉密、玛廷山、德克登吉、珠奇、富钦、阿库里大小参场,皆以盛产人参而闻名。但是,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赫哲人、恰克拉人、费雅喀人却并不以采集人参为生,仍然从事渔猎活动^[27]。那么,在清中期封禁时期,既无土地耕种,又无法做劳工为生的关内流民,便将自身所采集的人参同当地民族民众进行交换。虽然有禁令,但仍有“携带米石什物,卖与偷创之人易换人参”^[28]的现象。

清代,同为东北三宝之一的貂皮,主要用于岁贡。黑龙江上游的布特哈八旗中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民众“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24]²²³。在雍正六年(1728年)之前,宁古塔城曾经是东北各族进行貂皮贸易的中心。每年的春季前后,黑龙

江下游的不同民族民众便会奔赴宁古塔城,于上文所提及的“楚勒罕”盟会纳贡。“交纳貂皮,楚勒罕第一事也,造人格者员,余听布特哈自售,谓之玛克塔哈色克,译言掷还貂也。”^{[24]222}其中未达标准的貂皮,官员会“刖其一爪”^{[24]223},表明此皮可自行处置。吉林地区的贡貂和黑龙江地区大同小异,存在和“楚勒罕”类似的“木城贡貂”分散各处^[29]。木城多木栅环绕而成,内层供官员核验贡貂和日常居住为主,外层则为百姓自由贸易的场所。以索伦、达斡尔、鄂伦春为主的当地民族,在完成贡貂纳赋后,剩余部分貂皮便会私自变卖,以获取自身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这类互市行为就包含上文所提到的,当地民族以貂皮换取以中原汉人为主的东北移民种植的烟草。此外,移民从中原带来的瓷器、茶叶、布匹等也是互市的主要交换物品。集市的整体景象极为盛大,《卜魁城赋》描述道:“若其大辟市廛,时届五月,贡貂之余,各辏方物,商贾咸集,旗民毕达,蚁聚蜂屯。车膏马秣,褰帐连云,编茅荫喝。携累重以偕行,听子女之欢萃,通有无之贸迁,储经岁之生计。”^[30]促进了东北移民与当地民族的交往交流。

3. 手工业产品的互市贸易。随着关内及朝鲜半岛大量移民的迁入,东北农业迅速发展,荒地变良田,单位耕地农作物产量逐年增加。农作物的富余间接促进了东北手工业的迅猛发展。

清代东北制酒业主要以“烧锅”为典型。所谓“烧锅”,就是指用高粱等杂粮所酿以供民间食用的白酒。其实,“烧锅”技术的逐步提升和完善,源自清代晋商移入东北。乾隆初年晋商涌入东北后,大量制作烧酒,使东北酿酒业迅速发展。酿酒业在东北得以兴盛的主客观因素可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清代东北移民进程中,东北可耕种土地面积逐步扩增,粮食产量稳步提升,扣除纳赋外,民众可支配粮食存量显著增加。其次,烧酒对水的质量有

着较为严苛的要求,东北得天独厚的地下水资源,为烧酒提供了重要的生产原料。再者,东北冬季极寒的生态环境,当地民族剽悍骁勇的性格,催生了别具一格的东北酒文化。《黑龙江志稿》中记载,以鄂伦春人为代表,“得兽无论皮之贵贱,除易火药布粟外,悉以易酒。故凡入山者,见有鄂伦春人,予以酒,彼即报以皮,虽贵弗吝,投所好也”^[31]。这呈现出鄂伦春人和“烧锅”商人为满足自身需求,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互市往来。此外,赫哲人家中所贮存烧酒的数量也是其展现贫富差距的体现。若“有酒三二百斤贮瓮中”,便为富户了。由此,赫哲人多将其捕捞的鱼或者用鱼皮所制成的各类手工制品,同商贩换酒囤在家中。除了上述民族外,清代东北锡伯人、达斡尔人、蒙古人等,都在东北酒文化的熏染下渐渐嗜酒,不同类型的烧酒逐渐成为东北各民族间贸易往来的“硬通货”。

此外,虽然各民族间互市活动中榨油业不及酿酒业繁荣,但以“油坊”为主的各类场所,依旧在民族间商贸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榨油业的兴起与清朝东北大豆种植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得益于大豆生长对该地区气候条件的高度适应性,乾隆年间大豆产量达历史高峰,其间从东北运往南方的大豆总量达120万担之巨。榨油业一度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以中原移民为主的油坊商贾,向东北各民族广泛销售食用油,而榨油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副产品“豆饼”,亦成为民族间商贸活动的重要商品。“豆饼”作为榨油后残留的大豆残余物,因其较高的含氮量,多被作为耕地肥料。同时,在黑龙江地区,当地的鄂温克人与蒙古人多大量囤积豆饼,作为饲草的补充饲料,以备冬季牲畜饲养之需。

四、清代东北移民与各民族文化习俗渐融

从清初至清末,中原移民大规模涌入东北,晚清朝鲜移民也迁入东北,移民与东北各

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深,文化习俗方面的交流和融合也逐渐深入。此过程体现了东北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通过吸纳外来文化精髓,丰富了自身内涵。以婚姻、丧葬及信仰习俗的交融为例,可见其文化交融之深。

1. 婚嫁礼俗的逐渐趋同。由于地域的差异以及所受文化熏陶的不同,各地婚俗各有差异。清代随着东北移民入境,东北各民族间的婚俗也在悄然浸润互融。

清初,清廷为进一步巩固刚建立的政权,缓和民族间的冲突和矛盾,一定程度上主张满汉不同阶级间通婚,实现结亲互助。但自顺治末年起,“旗民不交产,满汉不通婚”的规定逐步推行开来。这一时期虽满汉间的通婚多有禁令,但清廷对于汉人民女嫁满洲旗人这一行为,仍处于一种默认状态。于是,东北出现了一种“顶名婚”的风俗,以实现“私相聘娶”。所谓“顶名婚”,就是汉人民女顶上汉军旗人已经出嫁的女儿名字上册,以隐瞒其身份的方式嫁给满人男子。如果是红、黄带子与民女通婚,就让民人女子顶上不属于宗人府所辖的满人姑娘名字上册^[32]。

随着封禁政策的弱化,汉人人口比重增大,同满人间的通婚规模也逐步提升,二者间的婚姻习俗由渗透走向趋同。例如,《黑龙江外记》载:满人“女既聘,婿先行叩头礼,然后送簪珥衣服,富者或致羊豕鹅酒,谓之过礼。娶之夜,婿家黄纸朱书‘麒麟在此’四字贴门上,女乘采舆,舆前悬筛罗及镜,沿路放爆竹,鼓乐导之。明日设席待亲族,贺者至,饮酒三杯辄去,择日更设席谢之”^[33]。上述民间婚嫁仪式中,可以感受到既有满族人的特色,又有中原汉族人的风格。满族人逐步吸取汉族人“择吉纳礼”的传统,婚礼流程逐步变得繁琐。同时,满人也受到了中原汉族人婚姻要由媒人作为中间媒介的影响,男女双方的婚事要由父母和媒人商讨而定,即“婚姻之事,依媒人之言,听父母之命,无父母叔伯主之,无叔伯族之

长者主之,而子女不与焉”^[34]。清代身居东北的回回人也受到了如此影响。回回的媒妁之人主要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阿訇、乡老或者亲友充当。“凡男家欲求婚于女家,先遣媒妁致意,女之父兄需阴以问女,如女之不理,其父兄则不强;若女掩面哭,即系允可之意,其父兄即出而应允。”^[35]同样,在东北的达斡尔人、鄂温克人、赫哲人等不同民族,也渐渐地将媒人作为婚姻介绍人,最终的亲事成否跟媒人存在着极大的关系。

2. 丧葬礼仪的相互影响。东北满人早期丧葬礼仪主要采取火葬的方式,其认为“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36]。再者,清初政府财政紧张且政权未稳,军事行动频繁致大量伤亡,为节约资源并妥善安置遗体,火化成为理想的处理方式。随着清军入关以及大批量中原汉人进入东北,满人的丧葬习俗逐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浸润。汉人认为“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人死后一定要将遗体入棺埋入土地,以求入土为安。唯有怀孕而死、吊死、非正常死亡、姑娘得干血癆病而死,才进行火葬^[37]。东北满人早期丧葬仪式流程相对关内较为简约,逐渐受到汉人“孝”文化的渗透,其丧葬仪式逐渐变得繁琐。例如,“男女以粗白布为衣、冠,衣曰孝衫,冠,男曰‘孝帽’,女曰‘包头’;以麻为经束于腰,长短、粗细视其服之轻重为之,端垂身后,父母俱没者双垂。以衫、帽、布给戚友者,曰‘散孝’”^[38]。还包括为死者整理妆容、衣殓、摊尸、烧“落气纸”、装棺、圆盖等各类流程。而且,人在去世之后不可即刻下葬,需停灵一七、三七、五七、七七不等,同时逝者子女需于灵柩前彻夜守灵。同样道理,汉人移民在迁居东北后,也逐渐受到满族人丧葬风俗的影响。其中最为主要一点,就是改变了原来守丧过程中停止生产活动的风俗,将其转化为在逝者去世的百日内不可以剪发、不可以从事文娱活动的习俗,极大程度上保证了生产活动的连

续性。

3. 民间信仰习俗的逐渐交融。东北当地民族早期受制于相对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其宗教信仰历经了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演变历程。自清代以降,伴随移民潮的涌入与经济结构的变革,该地区民族的信仰习俗亦逐步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与变化特征。

在清代东北移民浪潮中,随着东北当地民族与汉族人的长期交往交流,促使当地民族广泛接纳了中原盛行的佛教、道教信仰,并逐步建造佛寺、道观,供奉释迦牟尼、玉皇大帝等神祇。此间,关帝文化尤为显著,几乎渗透至东北的城乡各处。《燕行录》中曾经这样描述:东北“家家奉画关帝像,朝夕焚香,店肆亦然。关帝庙必供佛,佛寺必供关帝。为僧者一体尊奉,曾无分别。有村必有寺有庙”^[39]。满族人和蒙古族人因关帝“忠义”的形象,进而对其极为爱戴和崇拜。在《朝阳县志》中记载:“汉族多供神,蒙族多供佛与关帝而已。”^[40]满人甚至在祭祖仪式中皆纳入关帝祭拜环节。随着东北引进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整体作物产量得到显著提升。在依赖自然条件的农业社会,东北当地民族受汉人关公显灵解决水旱灾害传说的影响,开始修建庙宇、举行祈雨仪式。

在移民对东北各民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满族人和蒙古族人的萨满文化也对东北移

民的生活产生反向影响。例如,迁居于长白山地区以挖参谋生的移民,其在挖参时会携着一根棍子,挖参人将其称之为“叫棍”或“索拨棍”。所谓“索拨棍”,就是一根以铁梨木或黄杨木等硬木制作的长五尺二寸的木棍。挖参人手持“索拨棍”不断敲击身边的树干使之发出声响,进而互相交流。其实,挖参人的这种沟通方式便是受到了萨满文化的影响。在萨满的祭祀中,神的降临全靠法器奏出的声响去表达,这和挖参人的“索拨棍”一样,都是通过声音来传述思想,表达情感。挖参人晚间会把“索拨棍”立于门前,他们认为“索拨棍”也是“神杆”,有此神杆的庇佑,灾难和鬼神都不敢来打扰^[41]。所以,此类以“索拨棍”驱灾避邪的方式,也是萨满文化浸润的生动体现。

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移民东北的浪潮成为推动东北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关键动力,随着移民涌入的中原文化,在这片广袤土地的历史演进中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多民族间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与深远影响。一方面,民族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促进了心灵层面的深刻共鸣与相互理解,构建了跨越地域与族群的情感纽带;另一方面,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发生,强化了区域的社会凝聚力,促进了东北各民族在商业贸易、生产技术、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最终孕育出一种既融合传统又展现新貌的多元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 [1] 李宗双,范立君. 清末东北移民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J]. 贵州民族研究,2024(2):148-155.
- [2] 王妍. 清代的东北移民与民族融合——以辽宁地区为例[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83-89.
- [3] 徐世昌. 东三省政略:卷6[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967.
- [4] 阿桂,等. 盛京通志:上册·卷35[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639.
- [5]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第681册[M].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34:10.
- [6] 姜维公. 中国东北民族史:下卷[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295-296.
- [7] 张士尊. 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89.
- [8] 万福麟,张伯英,崔重庆. 黑龙江志稿:上册·卷8[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368.
- [9] 赵英兰.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M]. 北京:社

-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2.
- [10] 徐世昌. 退耕堂政书[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363.
- [11] 万福麟,张伯英,崔重庆. 黑龙江志稿:上册·卷16[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12] 方拱乾. 绝域纪略[M]//黑龙江述略(外六种). 李兴盛,张杰,点校.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109.
- [13] 杨同桂. 沈故:卷2[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368.
- [14] 衣保中. 中国东北农业史[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278.
- [15] 沈国冕. (民国)凤城县志:卷14[M]. 铅印本. 1921:23.
- [16] 衣保中. 近代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史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2:122.
- [17] 金毓黻. 奉天通志:第3册·卷120[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 [18] 包文俊. 梨树县志:丁编·卷4[M]//中国地方志集成·吉林府县志辑:九.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477.
- [19] 包文俊. 梨树县志:戊编·卷1[M]//中国地方志集成·吉林府县志辑:九.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 [20] 徐宗亮,等. 黑龙江述略:卷6[M]//黑龙江述略(外六种). 李兴盛,张杰,点校.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5:83.
- [21] 西清. 黑龙江外记:卷8[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84.
- [22] 阿桂,等. 盛京通志:下册·卷106[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1566.
- [23] 万福麟,张伯英,崔重庆. 黑龙江志稿(上):卷6[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266.
- [24] 西清. 黑龙江外记:卷5[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53.
- [25] 萨英额. 吉林外记:卷3[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93-94.
- [26] 杨宾. 柳边纪略:卷3[M]//姜维公,刘立强.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东北边疆:第8卷.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58.
- [27] 王佩环. 清代东北采参业的兴衰[J]. 社会科学战线,1982(4):189-192.
- [28] 马建石,杨育裳.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24[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733.
- [29] 丛佩远. 东北三宝经济简史[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209.
- [30] 英和. 卜魁城赋[M]. 国家图书馆藏刻本. 1830(道光十年):11-12.
- [31] 宋小濂. 北徼纪游[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54.
- [32] 吕欧. 清代东北地区满汉通婚刍议[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6):75-79.
- [33] 西清. 黑龙江外记:卷6[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65.
- [34] 刘爽. 吉林新志[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235.
- [35] 王世选,敏文昭. (民国)宁安县志:卷4[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848.
- [36] 清实录馆. 清高宗实录:第9册·卷5[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41.
- [37] 隋书金. 东北俗文化史[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496.
- [38] 恩麟修. (民国)兴城县志:卷11[M]. 铅印本. 1927:6.
- [39] 李宜万. 庚子燕行杂识:下[M]//燕行录全集:卷35.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448.
- [40] 周铁铮,沈鸣诗,等. (民国)朝阳县志:卷25[M]//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二十三.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456.
- [41] 曹保明. 乌拉手记——东北民俗田野考察[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138.

(责任编辑 程 莘)

identity is the emotional bond to build the common spiritual home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with diverse paths. By exploring and creating common symbols and shared spirits of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we aim to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we may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es for various ethnic groups; by enhancing the cohesion of Chinese culture, enhancing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we may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Overall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will lay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ew era;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actical Path for Ethnic Villages to Consolidat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edigree: A Case Study of the Manchu Village in Qinjiang, Fujian

YOU Hong-xia

Abstract: Cultural pedigre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issues related to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ime-space pedigree, ethnic pedigree, and formal pedigree of culture correspond to the carriers, subjects, and mediums for this consolidation respectively, thereby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its construction. As an ethnic village in Southeast China, the Manchu Village in Qinjiang of Fujian Province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n isolated society to an ethnic-embedding society over nearly 300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formed a time-space pedigre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nchu and Han peoples, as well as an ethnic pedigree characterized by “Manchu-Han familial ties” and a cultural form pedigree that emphasizes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This has laid a solid social foundation for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and identity aspects of cultural pedigre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By examining multiple dimensions—such as the time pedigree, space pedigree, ethnic pedigree, and cultural form pedigree of the ethnic villages—we can construct the ethnic groups’ identity to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t various dimensions. Consequently, a “pedigree-identity” path is established to consolidat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ethnic villages.

Key words: cultural pedigree; ethnic village;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pedigree-identity”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Northeast Immigrants and Local Ethnic Groups in Qing Dynasty

SUN Shou-peng, LI Yun-feng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flooded into Northeast China. They gradually lived together with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region,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in techniqu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ucted trade in commerce, and gradually got integrated in cultural custom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ulti-ethnic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n eclectic and diverse multiculturalism was formed in Northeast China, which in turn provided a strong cohesive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Northeast immigran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Northeast China;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uild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National Harmony: Political Practices of Nation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Kazakhstan

FANG Chang-ming

Abstract: Due to its complex ethnic composition, the border deline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lack of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a modern nation-state, external observers predicted that Central Asia might fall into long-term ethnic conflict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since the 1990s. However, the actual situation was quite the opposite.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a certain number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y did not put forward territorial claims, and countries in the area did not interfere in their neighbors' internal affairs due to ethnic issues. Taking Kazakhst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it strengthens national construction by construc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Kazakhstani", which not only ensur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Kazakhs but also safeguards the interest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goal of "ethnic harmony".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Kazakhstan; Kazakhstani; sense of community

From Little Tradition to Great Traditi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JI Zhong-yang

Abstract: The rich and diver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vividly illustrat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ongoing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 "past" and "memory". Only by safeguard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all ethnic groups can we enhance the influence and cohe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is regard,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ffirms the lifestyles and values of local and specific ethnic groups. This may strengthen ethnic identities, potentially generating centrifugal forces and having an unpredictable negative impact on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ffers from intangible culture. Through the UNESCO listing mechanism, the intangible culture of specific communiti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has been elevated to a national public culture shared by multiple entities. This presupposes that the state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re the primary entities responsible for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at all citizens share the right to access and use it. This framework elimin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evera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First,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edu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resolve conceptual contradictions, helping the public fully understand that through the listing process, local and ethnic-specific intangible cultur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national public culture shared by all ethnic groups. Seco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aesthetic innovation, the "past" of each ethnic group can be reinterpreted as a contemporary fashion shared by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hird, the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thnic regions can become cultural symbols shared by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